

文化节制下的协同进化:农业起源的驱动力探析

邵侃 杨庭硕

(1.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2.吉首大学 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农业起源的解读主要从环境要素、社会文化和人类认知三个维度展开,视角有别且所论各有申张,难以形成共识。从民族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视角切入,通过对农业起源的区域性、多元性和系统性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农业起源实质上是文化节制下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结果。人类仰赖文化形成的合力,为作物创造适宜的文化生态,进而促进农业革命的实现。因而,若要从根本上讨论农业起源的驱动力问题,不能不重视人类社会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生态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农业起源;驱动力;文化节制;协同进化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2-0013-05

The Coevolution under Cultural Control:the Driving Force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SHAO Kan YANG Ting-shuo

(1.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2.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Jishou, 4160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f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has mainly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social culture and human cognitio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re different and the consensus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s essentially the result of the co-evolution of human and nature under cultural control,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diversified and systematic of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Depending on the resultant force of culture, human create appropriate cultural ecology for crops, thus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Therefore, to fundamentally discuss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important value of cultural ecology should be taken into the value.

Keywords: agricultural origin; driving force; cultural control; co-evolution

近年来,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成为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方向的热门议题,相关著述更是颇为丰富。农业起源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跃迁,目前关于农业起源的探究主要从环境要素、社会文化和人类认知三个维度展开,难以达成共识。从民族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视角探究,农业的起源是在特殊的外部压力下,文化在部落内实现有序的组装,形成完整体系,从而使最初的农业生产能够避免一切干扰因素,靠文化支撑而形成稳定传承。若要从根本上探究农业起源的驱动力问题,应当将其视为社会性的系统文化

[收稿日期] 2020-02-07

[基金项目] 武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项目(16JDZB086);2018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8B309)

[作者简介] 邵侃(1983-),女,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生态史;

杨庭硕(1943-),男,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学、历史学。

工程,重视人类群体靠文化形成的合力,方能形成整体性的认知和诠释。

本文引用的资料数据主要包括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和民族学调查材料三个方面。其中,历史遗迹和历史文物虽然常常是残缺不全的,但在确定时空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在使用历史文献时,应注意辨别记载的时序性,避免倒果为因的考察;民族学调查资料的整理与应用也是不可缺少的,正如白寿彝先生曾提到,考古学所能提供的不可能是古代社会的活体,只是古代的遗物或者遗骸,而民族学所能提供的却是古代社会活生生的模型^①。

一、对农业起源多维研究的述评

西方学者关于农业起源的探索始于19世纪中期,以瑞士湖居文化遗址中发现农作物遗存为契机。20世纪前期,柴尔德提出的“新石器革命”理论更是为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掀起世界考古学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研究的一股热潮^②。中国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农史研究的推进和农业考古的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农业起源问题,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从环境要素、社会文化和人类认知力三个维度来探讨农业起源的时间、地点和动力。

其一,基于环境要素的解释。在环境解释方法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绿洲模型”“宾福德(Lewis Binford)的边缘理论模式”“新仙女木事件模型”“季节模型”“共同进化模型”“路径依赖模型”等等。这类解释主要关注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变迁对人与动植物间关系的影响,但对人类群体合力所能发挥的作用却疏于考量。例如边缘理论模式,认为在资源富余地带生息的人们由于人口的增长和海平面上升的环境压力,向边缘地带移动,同时将谷类移出其自然生长的环境,从而产生了最初的谷类驯化和农业生产。科恩(Cohen)等人认为史前曾发生过食物危机,食物匮乏迫使人们去干预作物的生长活动,使之增加产量,进而催生出农业的起源。很明显,这一理论模型将人口迁移和农业起源的动因单纯归结于自然胁迫,却没有考虑人类不同群体之间所能构成的更紧迫的社会胁迫。在原始的狩猎采集模式之下,如大家熟知的贝冢文化、印第安夸富宴文化等,几乎不可能有食物匮乏的存在。同时,农业在起源阶段,与采集狩猎相比,并没有产量优势。因而,仅从自然胁迫的角度探寻农业起源的动因未免有失偏颇。

其二,基于社会文化的解释。民族学和社会学领域,很多相关的研究对环境决定论提出批评,并主要从人口压力、社会交换等方面对农业起源加以阐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人口压力模型”“丘陵侧面模型”“边缘化模型”“社会经济竞争说”等。“丘陵侧面模型”认为旧石器时代末中石器时代初,人类已经做好文化准备,获得对周围环境的相关认识和足够的技术能力,在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共同驱使下,出现最早的农业。实际上,文化的发展与人类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紧密相关的,处于采集狩猎时期的人类文化与农耕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来看,为了采集狩猎而获得的认知对农业起源意义不大,狩猎采集的文化价值并不能服务于农业生产。“人口压力论”由博赛洛普(Ester Boserup)提出,认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自提出以来,“人口压力论”成为解释农业起源的主流理论,影响颇为广泛。但田野调查资料表明,采集狩猎民族的人口数量一般与其所处区域的环境承载能力是相匹配的。如世居中国东北部地区,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的鄂伦春族,在生计模式变革之前,并未出现过人口的激增。游牧民族鄂温克族、渔猎民族赫哲族的相关材料表明,他们的发展史上也未曾出现过明显的人口压力问题。

其三,基于人类认知的解释。这一解释路径中,人的思维或象征性、认知力和心理文化方面较多的受到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心理—文化模型”“Domus模型”等。如考文(Jacques Cauvin)认为农

^① 白寿彝:《史学概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年,第165页。

^② 张修龙、吴文祥、周扬:《西方农业起源理论评述》,《中原文物》2012年第2期。

业起源主要是在思维上和象征性上的改革,明确反对从环境压力、人口变化和文化等方面解释农业起源,认为应该主要从认知力上寻找线索。这类理论只看到了象征性变化,却明显忽略了农业活动的发生。农业起源是社会性的总体变革,在思维和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使这种差距成为全文化的共识,对农业起源来说尤为重要。因而要实现农业起源,必须达成全社会共识,个人思想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各理论流派多从其本专业的角度对农业起源进行阐释,缺乏更综合而全面的考虑,难以取得共识。农业的起源是自然和社会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来自于自然的压迫不足以让人类万众一心,但要应对部落之间对资源与环境的争夺,则有可能在短期内构成整体性的压力,驱动各要素发生变革,产生农业。接下来,将从区域性、多元性和系统性几个方面,将农业起源看作一场系统性工程和社会性革命展开讨论。

二、区域性:迁徙带来的文化跃迁

采集狩猎时代,资源丰裕的区域是人类聚居首选的对象。但也正是由于区域内自然资源的丰富和稳定,资源获取相对便利,人类会逐渐对所处环境产生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会造成人类移动性的降低。随着聚居区内人口的日益集中,食物资源相对减少,竞争会不可避免的发生,部落冲突极大可能被引发,而资源竞争和部落冲突都会导致部落群体的分裂,出现不同的去向。

竞争中的“获胜者”不必迁徙,固守资源丰富的地区,区域内自然资源的再生可以满足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在原有的文化认知不变的情况下,采集狩猎模式被传承,很难产生实质性的文化革新。如我国古代瓯人,主要分布在山谷和平原近水处或者海湾内侧,自然资源丰富。通过对浙江省东南区域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考察,发现这些遗址先住民的生活可能主要靠捕捞和采集来维系,出土器物中未见铲、镰等农具,农耕出现的可能性不大^①。我国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贝丘遗址、洞穴遗址中也找不到农业迹象。

时至今日,我国东北的鄂伦春和鄂温克人、海南岛黎族人、台湾高山族人以及西南地区部分民族,还有北美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等仍保持着采集狩猎的生活状态,不知稼穡^②。如博厄斯(Franz Boas)和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笔下的夸图印第安人,由于居住地的海陆资源丰富,完全能够满足日常消费的需要,部落首领会在宴会上以看似非常浪费的方式把他们所拥有的财产分配掉,即为“夸富宴”。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在一个缺乏统治阶级的社会中,“夸富宴”的制度确保了物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持续,是该社会调节其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③。可见,“夸富宴”是资源丰富地区维系社会安全的有效行为,人类在这类地区的生存和发展从生计模式上来看并不需要产生实质性的跃迁。

而竞争中的“失败者”们不得不放弃原有的资源中心而迁徙到边缘地区。这固然是基于防御性的考虑,却不得不面对边缘地区资源短缺的问题。如何在相对不利的条件下,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保证部落群体的延续和发展,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生存压力下,人类不得不改弦更张,采取不同于以往认知的对策。为了创造稳定的生产区,确保作物在固定的生长周期内不受侵扰,被迫离开资源丰富地区的迁徙者们开始最初农业种植。比如,山地是我国农业起源的重要区域。从事过原始农业生产的南方民族,最初的种植业大多从山地开始。刘兴林先生曾讨论过山地崇拜源自农业的发生,是农业起源于山地的良好注脚^④。如“在森林里迁徙的民族”——哈尼族主要来源于氏羌部落,几次迁徙后,生计方式由游

① 梁岩华:《“瓯居海中”考》,《东方博物》2006年第4期。

② 刘兴林:《历史与考古:农史研究新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0页。

③ 张锦鹏:《人类学分支学科概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第136页。

④ 刘兴林:《山地崇拜与农业起源》,《中国农史》1997年第4期。

牧转变为农耕,并创造了山居农耕的典范,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研究广西少数民族的重要资料,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一书所称的“树薯而射生”,也是历史文献中对西南各民族早期农耕的记录。

三、多元性:多作物与多中心的文化样态

农业历史研究显示,世界各地的早期农业文明基本都产生在中纬度地区。相对温暖的气候环境,分明的四季更替,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显明的动植物生长周期等要素,彰显中纬度地带在文明孕育方面的地理环境优势,这一优势在禾本科粮食作物的驯化中凸显出来。温带大河流域四大文明古国的建立与发展,与其坚实的农业经济基础密不可分。禾本科粮食易于储存,能够长期维持区域人口的稳定,有利于大帝国的建立,因此其文化可以得到更好地传承。但这些地区的农业文明之所以备受瞩目,概因其稳定性、延续性和发展中所达到的高度。若以其发展的成果倒推其在起源阶段的地位,用传统农耕去反证农业起源,未免有失偏颇。

所谓农业起源的多元性包括两个维度,即起源作物的多样性和起源地点的多中心性。其一,农业起源具有作物的多样性。不仅是禾本科植物可以作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其他作物在早期国家的建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木本粮食作物和块根类粮食作物,但因这类作物难以储存、难以运输,难以共享,后续发展受到限制。其二,农业起源并非起源于单一中心。如中国的农业起源中心包括三个不同的区域:以小米为主体农作物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中心区;以稻谷为主要农作物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起源中心区;以块根茎类为主要农作物的热带农业起源中心区^①。“饮食人类学之父”西敏司(Sidney Mintz)曾指出,多数大型以及很多小型定居文明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复合碳水化合物化合物的耕种之上,例如玉米、土豆、水稻、粟或是小麦^②。除了禾本科植物,块茎类作物,包括一些木本植物,都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以富含淀粉、糖分和纤维的桃榔类作物为例,在早期的农业活动中,生息在我国古代南方的各族先民曾将其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后来,随着不同时期粮食政策的调整、生态环境变迁和相关民族的生计转型,桃榔类作物才逐步失去其主粮作物的地位^③。

尽管具有多元性,农业起源作为一种整体性行为,就其驱动力而言,实质是一样的。柴尔德(Gordon Childe)称农业的起源为“新石器革命”,作为人类文明的一次跃迁,农业起源是群体性行为,必须有强大的社会迫力,才能达成社会共识,而最初的食物资源竞争带来的群体竞争和迁徙,构成了农业起源所需的社会迫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区域农业模型已成熟,迁移族群的生计方式变革还要面临整体性的社会接纳问题。如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北方人民络绎不绝地南下,从根本上改变了江南地区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的面貌,但在生计模式的转型和整体的社会接纳过程中,也曾面临层层阻力。

四、系统性:文化节制下的协同进化

早在先秦时期,《逸周书》有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此农事之始也。”古文献中关于我国农业起源的记载是模糊的,却也包含环境、人类、技术等要素。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看,农业起源是人类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最早的耕作行为和耕作技术的出现、进步,需要社会建制的支撑和配套环境的支持,因而农业起源是一种社会行为,是

① 赵志军:《稻作农业起源中的城头山遗址》,《常德日报》2017年7月7日第8版。

② [美]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朱健刚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页。

③ 耿中耀:《主粮政策调整与环境变迁研究——以中国南方桃榔类物种盛衰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众多技术和发明的有序组装,是集体创造的结果。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讲,农业起源是人与动物、植物之间的协同进化过程,但这种进化并非纯粹自然的协同进化,而是文化本身的进化,即人类控制下的协同进化。人类仰赖文化形成的合力,为作物排除在自然界不可能排除的种内竞争、种间竞争,也为农作物创造能够更好生长的人造环境,进而实现按照季节收种。

所谓农业的“靠天吃饭”,并非一味强调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实际上,农业生产与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耦合关系,不仅是人类文化对自然界的简单适应,也包含着对生态资源的高效整合和综合利用。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认为人类文化的内核是文化与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经过磨合而形成的文化生态耦合体,而当地居民的传统生计是其主要外在表现^①。人类能够长久的生息于某一区域,区域生态系统也能基本保持稳定,就在于在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生计模式能够巧妙的避开该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防范生态风险,以确保该生态系统的持续利用和不断优化。

就农业起源而言,区域自然生态环境非常重要,但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生态系统尤为关键。如城头山稻作文化遗址,其中有田埂和灌溉系统的水稻田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面积最大的稻田遗址^②。该遗址中有完整的围壕和城墙的遗存,稻田与城池是稻作文化基本定型时期的最佳配置,这显然是经过先民们精心的设计而并非简单的巧合。城池既是为了提供安全保障的防御工程,亦为稻谷的晾晒和储藏提供必要条件。大量囤积的稻米成了新的争夺对象,战争再次发生,如此一来,战争的规模和城池的规模都会不断扩大。可见,是先民们为最初的水稻栽培创造了适宜的文化生态系统,水稻的价值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亦日益凸显^③。

五、讨论与建议

农业起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命题,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等诸多因素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交互作用,并且与人类活动耦合相融的产物。对于这一论题的探讨,不止于考古学、历史学,也不止于民族学,是故需要破除特定学科单一线性的思维和解读方式,将人、文、地、产等要素置于同一时空场域下进行整体性考察,方能准确把握农业起源的本质特征和历史逻辑。

在以往讨论中,考古学和历史学资料的应用较为充分,环境要素和技术进步被过多关注,但对人类社会的主观能动性却关照不足。在农业起源的过程中,人类的进化并非单纯的生物进化,社会迫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早期的资源竞争和族群迁徙引发生境变革、观念变革、生计变革等等,促进了农业革命的产生。这一人类文化的跃迁不是随机性的产物,也不是自然演变的简单派生,而是文化节制下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结果。因此,在对农业起源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应更多关注人类社会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文化生态的价值,如此,人类农业文化的最初形态才能得以清晰呈现。

[参 考 文 献]

- [1] 徐旺生. 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J]. 中国农史, 1994, (1).
- [2] 陈 淳. 最佳觅食模式与农业起源研究[J]. 农业考古, 1994, (3).
- [3] 樊志民, 李伊波. “弱者道之用”: 农业起源的人类主观因素分析论[J]. 中国农史, 2018, (5).
- [4] 杨庭硕. 民族、文化与生境[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 [5] 刘兴林. 历史与考古: 农史研究新视野[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① 邵侃、田红:《藏族传统生计与黄河源区生态安全——基于青海省玛多县的考察》,《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

② 赵志军:《稻作农业起源中的城头山遗址》,《常德日报》2017年7月7日第8版。

③ 杨庭硕、张颖洁:《探讨稻作文化起源亟待澄清的四大难题》,《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年第1期。